

1911 年保定防疫宣传研究

王璐瑶

摘要

清末东北鼠疫爆发，保定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交通地位，其疫情防控格外受清廷重视。1911 年 1 月，直隶出现疫情之后，保定迅速建立起以防疫局为核心的防疫机制。直到 1911 年 4 月 13 日，保定临时防疫局正式裁撤，近三个月的防疫工作宣告结束，在此期间，保定城内都未出现染疫之人，可见保定的防疫宣传政策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以 1911 年保定鼠疫防治宣传为研究对象，使用报刊作为主要资料，通过对保定防疫宣传手段、内容等情况的考察，具体探讨清末地方政府在重大卫生事件中对舆论宣传的考量，以及如何实现与普通民众的有效沟通，从而达到防疫政策顺利开展的目的。

关键词

保定、鼠疫、防疫宣传、白话文

作者简介

王璐瑶，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生。电子邮箱：1528186807@qq.com。

In 1911, Baoding epidemic prevention propaganda research

WANG Luyao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plague broke out in Northeast China, and Baoding was particularly valued by the Qing court for it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e to its special political status and transportation status. In January 1911,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in Zhili, Baoding quickly established an epidemic prevention mechanism with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as the core. Until April 13, 1911, the Baoding Provis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was officially abolished, an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of nearly three months was declared to be over. Based on the 1911 Baoding pla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paganda, this paper use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s the main materials, and discusses the consideration of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major health ev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how to achie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policy.

Keywords

Baoding, plague, epidemic prevention propaganda, vernacular

Author

Wang Luyao is a master's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Ethnic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1528186807@qq.com.

一、引言

清末东北鼠疫，1910 年冬最先在满洲里发现，然后沿交通要道南下蔓延至吉林、辽宁等处，后又渗入关内山东、直隶等地。此次鼠疫波及范围大，前后共历时 7 个多月，死亡人数多达六万余人，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还影响到了清末社会经济，影响力在晚清疫疾史中实属空前。关于清末这一场东北特大鼠疫，学界研究多聚焦在东三省地区，成果颇丰，但对于直隶保定地区的论述较少。直隶作为晚清首要之省，虽然面积只有满洲的三分之一，但人口却与满洲相等。保定作为直隶的省会，是东三省入关必经之道也是近畿地区，地处北京至汉口的交通要道。因此，保定的有效防疫，有利于将鼠疫严防于直隶之外，有利于保卫京师

的安全，也防止鼠疫进一步向关内南方各地蔓延。本文以 1911 年保定鼠疫防治宣传为研究对象，使用报刊作为主要资料，通过对保定防疫宣传情况的考察，来具体探讨清末地方政府在重大卫生事件中对舆论宣传的考虑，以及如何实现与普通民众的有效沟通，从而达到防疫政策顺利开展的目的。

二、保定防疫宣传的必要性

（一）保定的特殊位置

从政治定位上来讲，保定是直隶的省城。直隶总人口与满洲相等，省内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即京师和繁荣的工业城市天津，保定鼠疫防控一旦失守，就容易波及到京师和天津。鼠疫自东北蔓延之后，清廷多次谕令直隶总督陈夔龙严密查防，以防京津一带染疫。1911 年 1 月 16 日保定府（直隶省会）出现患者，民政、外务两部听闻保定府疫症已死数十人后，在 2 月 5 日特专电直隶总督陈夔龙让其饬令下属严防鼠疫。直隶总督陈夔龙也认识到直隶防疫的重要性，指出直隶“地方重要，人烟稠密”（陈夔龙，1911）。可见，清廷对保定的疫情防控非常重视。因其地处近畿地区的特殊性，保定防疫比其他地区有着更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人口迁移上看，保定地处交通要道，人口众多，且是东三省苦工的主要来源之一。波及直隶和山东时，鼠疫已经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指出，

在 1 月第三阶段鼠疫传播的速度和规模似乎由两个主要原因导致：首先传染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中积累，如哈尔滨（傅家甸）、长春和奉天；其次是山东和直隶等省的苦力，为了在 1 月 30 日新年赶到家中团聚，从而使鼠疫向南传播。一旦鼠疫在山东和直隶找到立足点，就会从芝罘和铁路通过陆路向两省辽阔的农村蔓延（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1911/2010:519）

可见直隶防疫的重要性。保定地处京汉铁路上，在这次鼠疫传播中铁路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因此，保定的有效防疫，有利于将鼠疫严防于直隶之外，有利于保卫京师的安全，也有利于防止鼠疫进一步向关内南方各地蔓延，是关内重点防疫的城市。

（二）民众对于鼠疫的了解不足

20 世纪初期，虽然随着民族思想的全面觉醒，西医知识随着西学传入中国，并在沿海开埠地区迅速推广。但中国传统社会对疫疾的认识还没有真正达到科学的程度，一旦有疫疾发生，最容易大规模传染。清末中国各社会阶层并未对疫病形成正确的认识。清末民众对于疾病的认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瘟疫的出现为天灾，称其为“有神主持，有鬼施散”，是“鬼神作祟”。因此，每当遇有疫疾发生，“请神驱瘟”的防疫观念依旧占据主导。一类认为瘟疫的产生是因为“阴阳失和”，即“疫气致疫”，应当借爆竹硝磺“扶阳抑阴”并以此驱除邪祟。

清末社会虽说在医学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医学知识以及与医学相关的卫生知识并未成为社会常识。面对大规模流行的疫疾，普通百姓并不清楚产生的原因也不清楚传染的方式。因此将其归于“鬼疫”。社会整体相对落后的医学条件，让民众对染疫后获得治愈并不抱希望。于是在疫疾大规模肆虐营造出死亡的恐慌中，求神拜佛是普通民众唯一的出路。但不论是延请僧人开坛讲会亦或者举办驱瘟赛会，都容易造成人员密集从而导致瘟疫加速扩散的情况。因此，宣传疫疾知识，让社会各阶层了解疫疾从产生到传染的因果过程，有利于将社会对疫疾“鬼神作祟”的思想观念破除，重新树立疫疾是由微生物传染的科学观念。

（三）卫生观念落后

晚清时期，社会整体卫生观念落后，卫生体制处于起步阶段。东三省鼠疫迅速蔓延以后，社会上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卫生的重要性，积极呼吁各方注重卫生。“中国人民平日于卫生之

学绝未讲求。一遇疫疾发生，非坐视死亡，即张皇失措。虽有官吏之督饬，法令之颁行，而既不能消弭于事前，又不知慎防于临事情。此东三省之鼠疫所以蔓延而不可收拾也”（大公报，1911）。卫生观念的落后源于科学的落后，没有科学的指导就无法对疫疾形成正确的认识。在政府推行防疫政策时，普通民众坚持传统的观念，非常不利于落实防疫政策。

防疫手段与社会传统习俗相冲突，各种谣言随之而起，普通民众面对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选择逃避甚至反抗。1910年鼠疫在东北爆发以后，政府迅速建立各级防疫机构，实行检疫政策。普通民众对鼠疫的不了解，混乱的社会秩序以及落后的社会认知，留给谣言滋生以及大范围传播的空间。鼠疫的迅速传播以及政府展现出来的紧急状态，使疫区民众陷入恐慌之中。各种谣言的传播，使“无病之家不愿受公家检验，有病之家不愿用公家医药，互相隐瞒，各怀疑懼”（吉林官报，1911），严重阻碍了政府防疫政策的推进。东北鼠疫蔓延开后，上海租界工部局积极实行疫情防控，对租界居民实行严格检疫政策。因上海公共租界查验鼠疫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医学不同，在检疫过程中又存在语言不通等问题，导致1910年11月12日爆发检疫风潮。上海检疫风潮爆发后立刻受到了全国界的关注，上海租界工部局经此事也认识到宣传防疫知识的重要性。14日，工部局坐办与报界讨论此次风潮时，建议各报纸设法开导民众，让民众知道鼠疫的危害以及防疫的必要。16日，上海道刘观察于洋务局与商界中十余人会谈时，指出“公共工部局发起查鼠疫一事，其实确为华人保护卫生起见。然惜于事发之前未曾宣布美意，而且办理操切，难怪华人顿生疑虑致起聚众罢市之风潮”（神州日报，1910）。

综上，民众对卫生观念以及防疫认知的不足，给防疫政策的推进造成了巨大的阻力。鼠疫蔓延到保定时已经是第三阶段，保定的防疫可以借鉴东北以及上海防疫的经验。对于保定来说，宣传疫疾相关知识，化解民众对防疫的误解以及社会上流传的谣言，有利于减少防疫政策实行的阻力。

三、保定防疫宣传的内容

保定防疫局准备了多种宣传资料，这些资料有从别处防疫局发下来的，也有自行编写、印制的。保定此次防疫宣传内容广泛，且各种防疫宣传内容都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除了增加民众对鼠疫产生的原因以及症状外，还向民众强调鼠疫的危害，最后向民众普及一些鼠疫防范知识以及治疫良方，可谓是站在民众角度考虑到了方方面面。

（一）阐明鼠疫爆发原因

20世纪初，英美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的发展，现代医学技术也随之发展，其深知疫病的病原在于细菌。同时期的中国，医学知识并未普及，社会整体对恶疫流行的认知还处于“鬼神作祟”的阶段。即使自觉擅长岐黄之术的中医，“知病原菌殆亦寥寥若晨星也”（中西医学报，1911）。1907年奉天鼠疫，《盛京时报》倡导政府正确防疫时，就指出“令人知时疫所由传染，必能预为之防，方可以免于患”（盛京时报，1907）。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若想要预防时疫，必须要正确认识到疫疾产生的根源。

古时中国疾病产生主“气”，疫病则是因为“疫气”。1911年保定省城防疫局传单指出，古时“疫气致疫”观念存在的原因是没有显微镜，“故云天地不正之病气皆谓之疫。疫，夫谓所谓不正之病气即湿热秽三气”（北洋官报，1911）。通过传单解释疫疾观念之后，紧接着又向社会普及鼠疫产生的原因。

东省自日俄战争后，其地中必多死尸，秽之气潜伏。遇去年冬令天气太暖，不能藏闭，而毒发也。观拳匪乱后一年，北地大疫，知尸秽之，足以酿疫也。信然，或曰既称天暖毒发，何以不发于夏秋，而发于冬令。不知夏令炎热阴秽毒气见日光则消烂，不能直接传人。天冷则鼠族穴居，鼠阴类也，感召毒气最速，间接传人（北洋官报，1911）。

保定防疫宣传中认为鼠疫是因为东北日俄战争以后，战场未处理的死尸滋生病菌后传染到老鼠上，而后老鼠与人接触便得以传染给人。虽然在事后的奉天会议中，研究得出鼠疫的原因是土拨鼠，但不能否认保定对鼠疫原因的宣传，有利于引导民众走出“鬼神作祟”的疫疾观念，从而接受科学的防疫手段。

（二）绍鼠疫症状与危害

清末中国整个社会医学落后，在东北爆发鼠疫之后医员紧缺非常。各医生医学知识水平高低不一，在检疫过程中鼠疫认定标准也不统一。处于统一检疫标准的目的，保定防疫局通过传单宣传感染鼠疫后的症状。“（一）头痛兼昏晕者；（二）咽哑发热恶寒甚者；（三）胸腹胀闷或痛者；（四）吐痰沫中见血或黑水者；（五）脉数极或沉伏心乱神昏或发斑点者。（后二条为主要）如具以上三、四项见证，可下鼠疫之诊断”（北洋官报，1911）。

清末社会，因卫生体制并未健全，城市规划也未发达，商业繁盛的商埠最容易滋生疫疾。每年盛夏之时，各地疟疾吐泻时常见刊于诸报纸，民间把各种疫疾都统称为疫，“每届夏秋之交各省之以疫告者，几致罄南山之竹，书不胜数”（申报，1899）。东北鼠疫爆发后，普通民众并没有认识到鼠疫的危害剧烈之处，将鼠疫与平常疫疾一样对待，以此造成鼠疫传播的加剧。因此保定在防疫宣传时，尤其注重强调鼠疫危害之剧烈。保定省城防疫局派委员赴各州县“向各村人民演说疫症传染之利害，当面散给告示”（北洋官报，1911）。保定防疫会还利用白话演说宣传鼠疫的危害，“就说印度闹这个病，前后死过三万多人，真是可怕。今闻关东吉林闹这个病，一天死一百多人”（北洋官报，1911）。只有让民众认识到鼠疫的危害之后，才能更好的宣传普及防疫手段，从而取得良好的防疫效果。

（三）宣传鼠疫的防范

1911年保定在防疫宣传时，对于鼠疫防控的宣传分为个人防护与公共防疫两方面。个人防护方面，首先强调居民应注意清洁。清洁包括个人身体手足的清洁、房屋的清洁、衣服被褥的清洁、食物饮水的清洁等方面。其次，强调病原的消杀。包括消灭老鼠、强日光晒被褥等。最后，强调防止二次感染。已感染鼠疫的人应即时隔离，防止传染别人；迅速深埋因感染鼠疫病死的尸棺并将其衣服焚毁；感染鼠疫的人应及时送入临时病院。公共防疫方面，主要强调城市公共卫生。包括街道、店铺清洁，以及公共场所遍撒石灰消毒等。其次是防止人员聚集。主要是针对商业场所，例如戏院暂停营业，澡堂检疫以后才可以进入等措施。后来的研究证明此次鼠疫主要是通过排泄物和尸体传染，“没有任何疾病如鼠疫这样在痰液中包含着如此多的病菌”（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1911/2010:545），“在那些死于肺鼠疫的患者尸体中，鼠病菌仍然活着和具有毒性”（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1911/2010:547）。在保定所宣传的防疫措施中，强调隔离手段和以及对染疫尸棺及相关物件的及时处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鼠疫的传染与扩散。

（四）推广治疫药方

“民众面对瘟疫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时，首先是极度的恐惧，极度的恐惧容易使人丧失理智，转而迷信，从而排斥现代防疫手段”（胡勇，2003）。面对民众这样的心理表现，除了规劝民众防范鼠疫之外，保定防疫会也会在传单上印制治疫中医药方，以供民众采纳使用。也在《北洋官报》上刊布武强县分送给民众的《恶核良方》，又称为解毒活血汤，并特别指出此药方“传自广东，屡经奇验，活人无算”，并且“此方专主治血异兼解表，施之疫核确能起死回生。此症多起于冬至前而衰于夏至后。广东由甲午至甲辰十余年来，历试不爽也”（北洋官报，1911）。除了将药方公布以后，还详细列明每一种症状对应一种服药方式，“核小色白不发热为轻症，立即急治，不可延缓，原方单剂，早八点钟服一次，晚六点钟服一次，共服药二剂；核虽细而红头微痛身微热为稍重症，原方单剂早点八点钟服一次，晚四点钟服一次共服药三剂……”，并劝导民众“照法服药方能见功，切勿迟疑，自误可惜也”（北洋官报，1911）。虽然在鼠疫消退后奉天举办的鼠疫会议中指出，“在这次鼠疫流行期间，没有

一位通过细菌检验确诊的鼠疫患者曾经康复”，对鼠疫的治疗“似乎没有什么治疗方法获得成功”（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1911/2010:532）。但治疫药方的宣传普及从某些方面来讲一定程度上可以抚慰人心，减少社会恐慌。

四、保定防疫宣传的特点

防疫宣传是为了弥补官府防疫工作的不足，需要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鼠疫多在贫民之中发生，如何使缺乏卫生观念、教育水平又底下的普通民众，能够了解鼠疫知识和防疫的具体方法，绝非容易之事。

（一）多手段进行防疫宣传

在清末的舆论宣传体系中，官府告示、地方报刊、宣讲所演说其实是三位一体的。清末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传递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官府告示以及相关批示。基层政府告示文牍复杂，宣政效果其实算不上很好。1907年奉天鼠疫，警务局出示晓谕，令居民自防疫疾。《盛京时报》评论其谕令各条“无一非切实可行者”，并指出中国谕令、告示等“向来以鞣黼文章，标榜于闾阎。除诛求科条外，每事皆照例施行，以掩饰朝野人之耳目，而不顾其实际”，于是就出现“无论何等示谕，明揭于通衢，人皆熟视无睹。反不若戏单广告，遍贴于各墙壁，而不识不知者流，争先睹之为快”的状况（盛京时报，1907）。清末社会，报刊担负着“宣国政”、“启民智”的社会功能，是“人群之镜也，文明之母也”（东方杂志，1905）。于是报刊也会刊载各省告示，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清末中国社会整体受教育水平并不高，识字的人很少，能顺畅阅读文言的人更少。于是清末基层官府把演讲书报视为弥补报刊不足的手段。

保定防疫宣传也遵循这一套宣传体系。在保定地区尚未出现鼠疫时，知府就会同保定工巡总局出示晓谕告示，列出详细的防疫方法，在城内各街巷张贴，供民众阅看。保定防疫系统建立起来以后，为了推进防疫工作，各机构都有张贴告示以及相关批示宣传指导防疫，告示有《保定临时防疫事务局告示》《保定府清苑县会街告示》《保定捐务局告示》等，批示主要是保定临时防疫会对澡堂、戏院等场所防疫工作的相关批示。除了张贴以及报刊同步刊载之外，保定防疫局还派委员赴州县当面给村民散发告示，并劝说村民掩埋染疫尸棺，加大防疫宣传力度。除了告示以及批示这种比较正式的官府公告之外，保定还采用政府传单的形式宣传防疫。《省城防疫局传单》主要宣传鼠疫原因、捕鼠方法、检疫标准、治疫药方四个内容。考虑到民众的文化水平，保定防疫局在派人到宣讲所进行防疫演讲。保定防疫局相关的告示、批示也会在《北洋官报》上同步刊载，临时防疫局的防疫报告以及直隶学务公所防疫报告也会在《北洋官报》上刊登，以便公众及时了解疫情发展状况。《大公报》也会刊载相关防疫宣传文章。

（二）使用白话文进行防疫宣传

清末在各报刊之间掀起了“白话运动”，与五四“白话运动”不同的是，“清末民初报纸用白话，根本目的还是知识启蒙，并不是为了语言变革，更不是进行语言变革意义上的思想变革”（高玉，2016）。比起传统的文言文，白话文具有通俗易懂以及更加接近民众等特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舆论宣传体系中“公众缺位”的现象。可见，清末官府和报人在舆论宣传中开始注意到“公众缺位”的情况，把白话文看成是社会启蒙的利器，创办白话报刊、使用白话告示、开展白话演说等，也成为晚清社会认为可行的社会启蒙办法。

遵行这一舆论宣传视角下移的思想，保定在1911年的防疫宣传中，比起文法也更注重跟民众的有效沟通，除了使用多种手段进行防疫宣传之外，在防疫宣传中也大量使用较文言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保定临时防疫事务局告示》使用白话文作为文字载体，其间转载了《民兴报》的白话演讲《二不可》，宣传鼠疫的危害以及防疫的必要。《保定防疫会白话演说》通过简单通俗的白话文宣传鼠疫的危害以及防疫措施等内容。

（三）实行防疫报告

清末随着近代报刊出现以后，对社会上的重大事件都会进行一系列的跟踪报道，灾疫也不例外。1908年水灾过后，汉口、武昌等地出现霍乱，《汉口中西报》对这次疫情采用《记疫》的形式设置专栏进行每日跟踪报道。但《汉口中西报》此次系列报道并没有形成固定的体裁与内容。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以后，《盛天时报》设立《新疫报告》专栏每日公布死亡人数，公布信息非常详细，包括住址门牌、患者姓名、年龄、籍贯、职业、自何处来、发病日期、死亡日期、死亡之地、病名等信息，报告末尾附有本日死亡总人数。

东北鼠疫蔓延之后，保定防疫局实行防疫报告制度，城内外有疑似患病者，立即报告防疫局，而后派医生前往查验医治，查验情况汇总成《省城防疫局报告》在《北洋官报》公布。《省城防疫局报告》内容包括日期、查验负责人、查验地区以及有无患疫情况。直隶学务公所每七日汇齐各书报告汇总成《直隶学务公所防疫报告》，报告内容大概包括时间、地点以及是否有疫。除了这两项常规的防疫报告，保定还有《省城防疫局临时报告》作为补充。保定实行防疫报告，及时将城内外疫情登报进行信息公开，以供民众了解疫情进展状况，缓解民众紧张心理。

五、结语

1911年1月中下旬，直隶天津、保定等地出现疫情，为了迅速控制住鼠疫的传染，保定建立起以防疫局为核心、各级机关互相配合的防疫系统。虽然直隶地区总体疫情较东三省轻，但因为直隶是入关必经之道也是近畿地区，防疫规模和力度都较大。为了顺利推动防疫政策的实施，对政府防疫政策、鼠疫相关知识的宣传成为推行防疫的必备手段。保定防疫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防止以往宣传出现“公众缺位”的弊端，尤其注重与民众的有效沟通，在防疫初期就认识到“现在我们中国人民的知识，本还没到那可以实行防疫的时候。在这个时候防疫的，就的用权变方法，对付着办，办法不能含糊，作用必须变通”（北洋官报，1911）。因此，保定在防疫中遵行着“因时制宜”、“权变”的思路，讲求“顺着人情”，体现在防疫宣传上就是根据普通民众的具体情况采用多种防疫宣传手段，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进行宣传，并且实行防疫报告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实现与民众的有效沟通，使防疫宣传呈现出较好的效果。直到1911年4月13日，保定临时防疫局正式裁撤，近三个月的防疫工作宣告结束，在此期间，保定城内都未出现染疫之人，直隶总督陈夔龙也认为此次防疫“扑灭亦尚敏速”，可见保定的防疫政策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 北洋官报（1911）。奏议录要：直隶总督陈奏直隶防疫人员请奖折。《北洋官报》，（2821），2。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1911/2010）。《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大公报（1911年1月19日）。对于天津防疫之感言。《大公报》，A3。
吉林官报（1911）。又示谕各色人等勿信谣言宜遵防疫禁令听凭救治检验文。《吉林官报》，（02），66。
神州日报（1910年11月18日）。检疫问题之近状。《神州日报》，B2。
中西医学报（1911）。四会疫疠横行。《中西医学报》，（15），4。
盛京时报（1907年9月22日）。论防疫之法。《盛京时报》，A2。
北洋官报（1911）。省城防疫局防疫传单。《北洋官报》，（2722），8。
申报（1899年7月3日）。防疫以清洁为先务说。《申报》，A1。
北洋官报（1911）。省城防疫局派赴各州县委员执行方法。《北洋官报》，（2723），9。
北洋官报（1911）。保定防疫会白话演说。《北洋官报》，（2682），9。
胡勇（2003）。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史学月刊》（10），73-78。
北洋官报（1911）。武强县立防疫会刊布恶核良方。《北洋官报》，（2726），7-8。
北洋官报（1911）。武强县立防疫会刊布恶核良方。《北洋官报》，（2726），8-9。
盛京时报（1907年9月22日）。论防疫之法。《盛京时报》，A2。
东方杂志（1905）。论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广白话演说。《东方杂志》，（08），165。
高玉（2016）。论清末民初报纸白话文运动及其历史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49-57。
北洋官报（1911）。文告录要：保定临时防疫事务局告示。《北洋官报》，（2693），6-7。